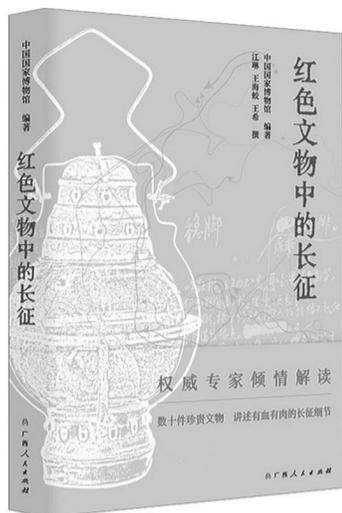


让英雄的伟绩光耀中华大地



长征,是中国历史上的惊天壮举,是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,是中国人民的精神丰碑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象征。由中国国家博物馆集体撰写的《红色文物中的长征》用历史遗存追溯峥嵘岁月,让英雄的赞歌广为传颂,穿越时光的甬道,一次次响彻神州。

一件文物可以反映一段历史,长征时期的红色文物是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记忆。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,而且保存和遗留了丰富多样的红色文物,这些珍贵的红色文物作为长征历史的物质载体,承载着革命先辈英勇奋斗、不怕牺牲、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,是党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,是我们党、国家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,而文物又堪称历史的“活化石”。如何把历史和文物,特别是红色文物在镜鉴历史中的作用最大化地发挥出来,作者们着实动了一番脑筋。他们凭借集体创作上的优势,在查阅了大量相关史料的基础上,严格按照时间排序,以馆藏的几十件长征时期的珍贵文物为依托,深情讲述红色文物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,将红军将士和人民群众的英雄事迹娓娓道来。

1934年10月,随着“第五次反围剿”斗争的失败,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,实行战略大转移。在这场两万五千里的艰难行程中,广大红军将士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,不畏牺牲、艰苦奋斗,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殊死较量,终于夺取了长征的伟大胜利。回顾这段历史,作者满怀对先烈们的敬仰之情,以时而沉郁、时而欢欣、时而肃穆、时而庄重的笔触,秉持着“见物、见人、见精神”的深刻意蕴,通过一件件泛着时代光华的红色文物,沿着红军当年跋涉过的路途,追寻着那闪光的历史足迹,并力求在以点带面中,抚今追昔,奋力书写出一部恢宏的长征史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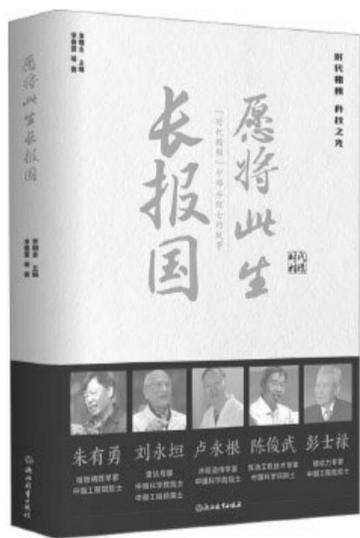
这些斑驳的红色文物是无数革命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。它们中有红六军团途经贵州石阡县打土豪时分给群众的毯子,彰显出人民军队与革命群众亲密无间的鱼水情深;有红军为抢渡湘江绘制的《灌兴全之间路线图》,体现出全军将士狭路相逢智者胜的英雄气概;有长征途中红军送给黎平向导的手提风油灯,昭示着革命的理想和信念代代相传;有红军强渡乌江时使用的棕绳,见证了勇士们誓死如归的革命豪情;有红军一渡赤水时遗留在战场上的手榴弹,真实地

映射出烽火硝烟中的残酷;有转战少数民族边远地区时红军发布的民族政策公告,生动凸显革命军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可贵品质;有泸定桥上的铁索链,血泪斑斑地诉说着勇士们飞身上索桥、斩关夺隘时舍我其谁的英雄本色;有志气凛烈烈士在战争岁月撰写的《可爱的中国》《清贫》手稿,字里行间充盈着浓浓的家国情怀;有中共中央为红一、二、四方面军会师发出的贺电,热烈的贺词里洋溢着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;有革命领袖接受斯诺采访时戴过的八角帽,为红星照耀中国增添了最美的时代注脚……

书中,作者犁开红色文物厚重的历史肌理,于宣讲革命故事的热切书写中,全景式勾勒出一幅雄阔的长征画卷。从“第五次反围剿”的失败,到江西于都拉开战略退却的帷幕;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翻越老山界,到遵义会议结束四渡赤水出奇兵;从强攻娄山关、飞渡泸定桥、夺取腊子口,到爬雪山、过草地、三军将士大会师,作者在描摹这场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时,除了集中展现出红军领袖们运筹帷幄的军事才能外,还热情颂扬了陈树湘、高秀英等一众人物的英雄事迹。他们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,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在他们身上,无不鲜明地体现出伟大的长征精神。他们把家国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,胸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,为了救国救民不惜付出一切。为了正义的事业取得成功,他们紧密团结群众、敢于奋斗的优良品格,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。

一件文物一首歌,一词一阙颂英模。红色文物上的沧桑印记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铭记历史,在开拓创新中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,于新时代的长征路上,奋力开创出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千秋大业。
来源:光明网

感受科学家的家国情怀



浙江教育出版社推出的《愿将此生长报国》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集,共收录5位作者的5篇作品。此书聚焦获得“时代楷模”荣誉称号的院士群体,展现他们的人生经历、事业成就、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。读此书,仿佛上了一堂又一堂带有科普性质的“专业课”、蕴含哲理意味的“人生课”、具有引领作用的“思政课”。

书中的5位院士,分别是植物病理学专家朱

有勇、雷达专家刘永坦、水稻遗传学家卢永根、炼油工程技术专家陈俊武和核动力专家彭士禄。从身份看,5位传主是“时代楷模”,是院士,这是“形”的部分。而他们情之所牵、心中所向都浓缩在书名的“报国”二字上,这是“神”的范畴,是人物形象的本质属性。也可以说,他们都在创造着、实践着“科学家精神”。

全书厚植家国情怀。5位主人公都是在“时”与“势”遭遇巨大困境的背景下,自觉将人生目标和生命追求,与民族、国家、时代紧密关联起来。比如,刘永坦出生于1936年,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之时。他是在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轰炸声中成长的。所见所闻所感,让他立下“做一个有担当的中国人”的誓言。卢永根1930年出生于香港,逃难中的饥饿感坚定了他日后投身农业、扑向大地的决心。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强大而深沉的信念感,以果敢和不屈直面困难、迎接风浪,又能甘坐冷板凳、潜心研究,力求“知行合一”,不断锤炼“择一事终一生”的专注品格。

知人论世是此书的一大写作特点。几位作者有意或无意突出“父亲”角色,强调“血缘”和“地缘”对一个人成长成才的重要影响。陈俊武学习英语碰到困难,失声痛哭不肯上学,父亲递来一条毛巾,让他擦干眼泪,进而严肃告诫说:“人生就是要遇到无数难题,害怕退缩必将一事无成。”“赤脚少年”朱有勇下地干活,看到父亲辛勤劳作却时常遇到作物歉收,遂有了长大给土豆

“治病”的念头。卢永根的父亲将“身劳苦学”“既买锄头又买书,田可耕兮书可读,半为儒者半为农”的家训赠送给孩子。刘永坦的父亲跟他有一次正式谈话,沉痛诉说当时国家正在蒙受的劫难,期待他能“为国家干点正事”。彭士禄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之子,他4岁时,父亲英勇就义。彭湃写下的“愿消天下苍生苦”的诗句,时常在渐渐长大的彭士禄的心中激荡。5位传主在父亲注视和期许的“目光”下长大成人,他们后来也成为父亲,接过赓续优良家风的接力棒。从美学象征上说,“父亲”是传统的象征,也是力量的象征。鲁迅先生1919年写过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,这声“诤问”响彻百余年,时时引发世人思考。《愿将此生长报国》以传记形式,不经意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应。

《愿将此生长报国》书写了“一类人”,突出了科学家的“共性”,同时也呈现出他们丰富而饱满的“个性”。几位作者不约而同从传主名字入手,来捕捉他们的个性。朱有勇在开拓事业的道路上“有勇”的一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,卢永根名字里的“根”,关联他与祖国的土地紧紧相连。写彭士禄则通过对照的写法展现出“科学大师”和“邻家大爷”在一个人身上如何“和谐共存”。

“共性”和“个性”的交融,使《愿将此生长报国》成为一本了解科学家精神与情感世界的书,它也是一本有价值、有风格、有营养的书。

来源:新华网